

金融走出去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 张兴荣

助力我国金融高质量走出去,应以战略全局和历史视角明确价值方位,以辩证和创新理念推动改革突破,夯实法治基础、守住风险底线,开展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临的主要挑战是金融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业务竞争力不强。

金融供给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三多三少”：走出去的银行相对较多,但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少;在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资源配置较多甚至有所重叠,但其他境外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相对较少;常规金融机构设立较多,但配套中介机构中比如中资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走出去的相对较少。

金融供给的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三个不足”：海外布局覆盖较为不足,金融基础设施投入较为不足,综合化金融服务较为不足。比如,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覆盖了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而中资金融机构仅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点;截至2018年末,“一带一路”沿线约50%的国家尚未与中国签署金融监管合作文件;在港澳以外的境外地区金融机构数量较少且根基不够牢固,投资银行、普通保险、金融租赁、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渗透率相对较低。

业务竞争力不强主要体现在“三个落后”。国际化水平相对落后,高端业务以及跨境资本运作能力较为落后。据2018年《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披露,中国境内公司到境外首发上市和再融资,总筹资额的70%由美资投资银行担任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集团、美国银行、美国大都会人寿等投资入股中国金融机构,均取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行、资产管理等高端业务、跨境大额并购等领域尚无较大突破。

此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将加大我国金融走出去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当前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压力、中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金融监管存在的短板、资本及人才的短缺

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走出去的步伐,短期内推动各类金融机构走出去实现跨越式发展存在一定难度。

以系统思维助推金融高质量走出去

推动金融高质量走出去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时与势的关系,明确发展目标与阶段,抓住发展机遇。

要在全面评估金融国际化发展规律和我国金融发展能力的基础上,科学制定金融走出去的发展目标和路线图,同时还要与国家大政方针保持协同。同时,优化监管审批流程,营造鼓励创新担当、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完善金融走出去防错容错纠错机制,让更多具备条件、基础良好的金融机构走出去,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利契机乘势而上,争取更大突破更优发展。

二是处理好供与需的关系,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明确以质为先、量质并进的金融走出去战略导向,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全方位、多层次的走出去金融支持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中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法律、会计、评级等领域专业机构扩大国际化布局,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的金融走出去梯队,建立走出去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协同工作机制,扩大有效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重点满足与中国战略合作关系紧密、经济金融往来密切国家和地区的需求。

三是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以开放促改革,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要打破传统思维,创新服务模式,破除不适应金融高质量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在中外机构合作与竞争中开拓新业务新模式,注重金融科技在跨国经营中的开发与应用。建设国际化综合化和能

力强大的金融机构总部,有效动员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资金、人力和政策等资源,实现全球协同发展;推出全球金融家培养计划,大规模培养国际化人才队伍,优化激励约束机制。

四是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完善金融监管,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根据金融改革开放的新要求,以及国际监管法律法规的新进展,定期重检和修订涉及金融走出去的各项法律法规,强化跨国金融执法、司法、守法和法治监督。持续推进金融机构合规体系建设,优化合规资源配置,使之与走出去的业务经营范围、组织结构以及业务规模相互适应,以此确保合规基础之“稳”。

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法治体系建设和金融监管政策协调,稳妥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自贸协定、投资协定有关跨国金融议题的谈判,推进全球货币体系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推动全球金融治理。

五是处理好危与机的关系,做到未雨绸缪、化危为机。

金融高质量走出去既要防范风险的预警机制,也要有主动应对风险的应急机制,力求化险为夷、转危为机。促进形成更强更开放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风险最为积极和有效的防御。

由此,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动态调整好金融资源的国内外配置。为促进科学高效的决策,加快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信息网络建设,加快国家和金融企业高端智库建设,形成全方位的危机预防体系。按照底线思维做好未来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研判预判工作,针对有关危机的可能传导路径,及早落实预案。同时,在开展应对各类国际金融危机事件过程中,强化国际协调与合作,不断积累实战经验,提高我国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竞争力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进入关键时期,乡村振兴处于战略起步阶段。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围绕我国“三农”问题实施的重大举措,两者正处于历史性的交汇期。与此同时,两者的内涵与路径也有诸多契合点。

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衔接,关系到农村工作重点的稳步转移,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序推进。加快和有效推进两者的战略衔接,亟需做好四方面的工作。

坚持政策衔接

精准扶贫背后的逻辑是贫困户由于自身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资本方面的欠缺,导致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通过自然竞争的方式难以获得平等发展机会和享受公平发展成果,从而陷入贫困积累的境地。因此,必须通过改变其外部环境和提升内在动力,实现对贫困户的靶向作用,才能打破这种均衡,使贫困户摆脱贫困,走向可持续生计发展之路。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也在精准。相比之下,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涉及“三农”发展、城乡协调等诸多领域,其背后的逻辑是乡村通过被动的自然发展难以有效改变城乡失衡以及乡村相对衰败的现状,必须通过对乡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整,才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振兴。

事实上,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当前应有序地将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的的精准扶贫政策与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为目的的乡村振兴政策相衔接,构建和不断完善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优化目标衔接

精准扶贫锁定的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通过“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实现贫困户“一超”“两不愁”“三保障”,以达到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精准扶贫瞄准的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我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重在补齐民生发展的短板,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保障所有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乡村振兴涉及乡村发展诸多方面,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振兴瞄准的是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重在补齐“三农”发展短板,保证“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

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成功实现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步,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重要基础,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开启与成功推进的基石。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更为深远和广泛,既是对精准扶贫成果的巩固,又是“三农”发展目标的新标识。实现两大战略目标的有效衔接,有利于农村重点工作的有序推进。

强化组织衔接

为保障精准扶贫的有效推进,我国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比如,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以及省(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村五级书记一起抓的联动机制;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税优惠、贴息贷款三种渠道的财政投入体系;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建立了特殊贫困人口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和教育补助、就业技能培训政策等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

上述高效严密的组织保障体系是保证精准扶贫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正处于起步阶段,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体系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通过研究精准扶贫的组织体系,总结和反思其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作用的经验和不足之处,使这一组织体系经过优化、改进与转化,合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组织体系融合衔接,将极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完善考核衔接

精准扶贫能够实现扶真贫、真脱贫,不仅在于正确的理论指导、科学的目标规划、高效的组织保障,还在于有一套从贫困识别到贫困退出的全过程严格考核机制。比如,在贫困识别环节运用科学适用的贫困认定方法,识别真贫,对错评和漏评现象进行问责,建立贫困动态调整机制给予自动纠错机会、引入第三方考核评估机构、对扶贫资金实行民主监督和严格审计等,有效地保障了精准扶贫政策落地见效。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做到杜绝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防止盲目跟风攀比,克服短期化行为及虚假繁荣等,也需要建立起符合推进乡村振兴特点的考核机制,构建起完善的指标考核体系。因此,在量化考核方面及时吸收精准扶贫考核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实现从精准扶贫考核到乡村振兴考核机制体系的转化衔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 马文武

金融高质量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随着我国企业的研、产、供、销体系日益全球化,需要一个与之匹配且比较有力的全球化金融体系支撑,使企业、人才和商品与货币、金融服务协同走出去。

金融业高质量走出去也是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的必要环节。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在全球的地位日益提高。

从全球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看,金融机构在海外的竞争力是大国屹立于全球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之一,强大的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大国在海外的闪亮名片。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助推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使命。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序推进,中国金融高质量走出去将能够更紧密地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参与并推动金融有关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金融高质量走出去机遇与挑战并存

目前,我国金融高质量走出去面

加速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 李世杰 郭庆寅

在海南全岛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既是彰显新时代我国继续深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性实践。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一年多的实践来看,离自由贸易港的内涵和目标仍有一定差距,亟需从多方着手,加快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

首先,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以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大局为主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因此,作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重大举措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将会推动形成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面对改革开放程度不高、改革开放领域不宽等问题,海南必须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以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大局为主线

推动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进程。一是全力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全力拓展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引进,扩宽服务贸易开放领域,不断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海南服务贸易国际进出口博览会等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名片,形成具有海南特色的服务贸易新体系。二是大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以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契机,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大力吸引全球优质资源集聚以及推动资源配置功能性机构与平台集聚,形成资源配置功能,充分利用好外部资源和市场,为推动构建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贡献力量。三是着力推动对外服务平台的做大做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支持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口岸和重要站点的关检部门开展合作,畅通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渠道。

其次,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仅依靠现有体制机制难以支撑其发展,建设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形成更加成熟更加稳定的制度体系,可

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也是“在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啃下一些硬骨头”的必然之举。

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利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高水平的开放平台,深入分析并破除阻碍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体制机制弊端,以思想大解放,谋取改革大突破。二是进一步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营造市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现代化市场环境,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创新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真正改善企业市场预期。三是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对标国际知名自由港,深化推进与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监管体制,并建立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绩综合考评体系和奖惩机制。

再次,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以人才引育为支撑。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用好用足人才资源,就等于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对人才资源的需求会更加迫切。从现实情况看,人才短缺依然是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短板,因此,更大力度做好人才引育并举,抢占人才高地,对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是更大力度做好人才引进工作。放眼全球不断拓宽人才引进渠道,简化人才引进流程,更加注重人才引进的国际化 and 年轻化以及优化人才引进结构,使之更好地匹配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同时,进一步强化措施加强人才引进后续服务,增强其归属感、认同感、获得感。二是大力重视培养本地人才。选派业务骨干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大胆提拔任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年轻干部,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让更多本地人才根植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学院)